

坂口安吾《白痴》的主题探究

——以伊泽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定位为中心——

王 净 华

要 旨：坂口安吾の代表作『白痴』は善と悪が背反し、日本人が自我喪失した戦争という空間を作り、青年伊沢が時代及び個人的な困惑に陥り、白痴の女を受け入れる倫理選択に遭遇し、戦争体制への批判と多重した倫理身分からの「墮落」を体験し、最後に救済と新生を獲得した物語を語る。この過程の中で、伊沢は白痴の女を自己存在の参照物にし、否定と批判の形で己の身分を見直し、「故郷」回帰の形で自己存在の根源を探り、己の身分を再確認した。安吾はメタファー、イロニーの手法を用い、危機感と不安感を抱えた日本人が当面せざるをえない「倫理選択」を指摘し、「白痴」という時代性の持つ「身分」を提示することを通し、独特な戦争観、歴史観及び人間性への認識を伝える。

キーワード：坂口安吾、白痴、倫理選択、倫理身分

作为战后“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的代表作，小说《白痴》于1946年6月发表在杂志《新潮》第6号，被视为《墮落论》(1946年4月)的小说化。《白痴》以1945年的日本为背景，描述了二战末期“东京大空袭”这一时期，日本民众陷入颓废，墮落的困境。⁽¹⁾ 小说的情节很简洁，文艺工作者伊泽发现邻家的白痴女躲入自己家中。出于好奇的心理与保护的冲动，伊泽收留了她，在与白痴女的肉体交媾与空袭逃难之中不断改变自身对于她的认识。经历了1945年4月15日的“东京大空袭”之后，伊泽最终选择了与白痴女在一起。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人”的墮落与救赎，认识到战争时期的迷茫与困惑，死亡与苟且，也可以认识到最终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定位。

作为坂口安吾的代表作，《白痴》这部小说可谓是倍受争议，毁誉参半。该小说甫一问世，就在日本文坛引起极大反响，给自战争体制向战后体制转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巨大的冲击，被誉为“战后最初的杰作”⁽²⁾。岛田昭男指出，小说《白痴》与评论《墮落论》的标题联系在一

起，具有强烈的召唤意识：处在日本战败之际的“破坏与荒废”之中，日本开始经历一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价值转换，日本必须直接面对这样的“精神性的虚脱与昏迷的状态”，由此，《白痴》这部小说才被称为了“杰作”。⁽³⁾ 不过，评论家平野谦认为，逃难之中的白痴女一度恢复人的意志，让读者产生了一种“人”获得新生的感觉，但是到了作品的末尾，人类的存在却依旧犹如“猪”一般丑恶，倒退回开篇的状态，因此难以称之为“杰作”。⁽⁴⁾ 十返肇亦认为，白痴女带给伊泽的感动如同梦幻一般，但是作者为什么不让伊泽与女人向着新生活前进？故而留下了不少谜团。⁽⁵⁾ 松本常彦则指出，主人公伊泽对待白痴女的行为充满矛盾，令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不安定的状态。⁽⁶⁾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充满矛盾的设定，荒诞的叙事手法，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让不少评论家对作品的主题产生质疑。

本论认为，这部小说营造了一个善恶背反，个性泯灭的战争空间，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伊泽陷入时代，个人的迷茫与困惑，遭遇到是否要接受一位白痴女的伦理选择，经历了否定战争体制与

职业身份的“堕落”，进而获得自我的救赎与重生的故事。小说阐述的危机与不安的时代语境，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迂回曲折的人物心理，恰好可以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加以梳理，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既充分亦合理的阐释。基于这一认识，本论试图站在这一视角，以《白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伊泽为对象，探讨“战争”这一语境下作为“人”的不安与矛盾，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主人公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定位，从而揭示出坂口安吾的战争认识、人性解读与历史批判。

一、迷茫与困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事件成为20世纪日本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日本文坛也由此完全陷入到一种“茫然自失，沉默失语”的氛围中。这一时期，日本作家撰写了不少文学作品来阐述这一现象。例如，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描绘了战败带来的“沉寂”；林芙美子在《作家手记》之中难抑“灰暗情愫”⁽⁷⁾；在《废墟的耶稣》之中，石川淳塑造了废墟的惨景和一个乞丐耶稣的“颓落”形象；在《废墟的审问官》之中，竹山道雄对于丧失信仰的现代人应何去何从提出了“追问”⁽⁸⁾。几乎与这样的叙事保持一致，坂口安吾在《白痴》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废墟”的乱象。

“那房子里曾经人与猪，狗，鸡，鸭同住一处，甚至食物都相差无几。”小说开篇极富张力地展现了一个人畜无异的混乱世界：“顶层一对母女，女儿未婚先孕，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女子挺着个大肚子，翘起个大屁股，走路的样子就和鸭子一样”“老太太接二连三赶走七八个情夫”“亲兄妹结成夫妇”“小妾和卖淫的待遇令人羡慕”⁽⁹⁾。在此，坂口通过夸张，荒诞的手法呈现了日本战争体制下的社会混乱，伦理失序，道德沦陷的世界，构筑起一个善恶背反，“扭曲”和“变形”的空间。

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空间，伊泽居住的小巷具备了战争，或者说“邻组”的本质特征。⁽¹⁰⁾所谓“邻组”，是政府内务省为了彻底统治国民而实施的底层组织，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最小机

构，其目的就是为了“国民道德的炼成，精神的团结”，普及全民道德教育，推广对天皇和国家的服务观念。不仅如此，坂口在小说之中还有意地渲染了战争，尤其是“东京大空袭”的惨境：“到处躺着的烧焦的尸体”“死得像烧死的狗一般”“像烧鸡一般”“这种卑贱的死没有丝毫悲痛”“连狗都不是，还谈得上是人吗？”⁽²¹⁾这样的叙述造成一种反讽的张力，构建起战争作为吞噬个体强大力量的宏大叙事。

迄今为止，很多研究学者就此将这部小说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将小说提示的一切问题归结为战争，并认为正是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导致“人类同猪犬家鸭一般”的生存状态。⁽¹¹⁾这样一个论断，也导致了围绕这部小说的文学批评一直陷入在了单调而重复的战争批判之中。事实上，坂口安吾在小说之中以“不确定性”的口吻，潜在地对于这一“根源问题”采取了否定与批判。

小说之中，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失序，沦陷的世界，伊泽感到不解和困惑，故而询问裁缝店房东：“是战争把这里变成这样的吗？”老板回答道：“不是，一直都是这样。”⁽⁵⁻⁶⁾这样一个回答，间接否定了采取“战争批判”的解读方式的合理性。坂口在小说的不经意之处，提示了“不是战争才这样，之前就这样”的一大真相。⁽¹²⁾换言之，“这里”之所以是这样的，不是战争导致如此，而是原本就如此。因此，“堕落”是一种原初性的，本质性的存在，不是“战争”的责任，而是“这里”原本就是一个“异样”的世界。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个世界，随着战争走向终结，“东京大空袭”的来临，也将会把伊泽彻底地吞噬。换言之，伊泽尽管对这一世界充满困惑与不解，尽管对之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伊泽想必最终也不得不沉沦到这样的世界之中。

那么，伊泽在小说之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接下来，坂口安吾将阐述的内容转向了伊泽的工作环境，并穿插了大量的人物精神活动。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文化电影导演，伊泽从事的工作充满虚妄，无聊透顶。伊泽以“贱业之中的贱业”一语来评价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要掌握

的只是时代的流行，不存在自我追求，个性和独创性”。（8）换言之，这一职业纯粹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且为旧制度的义理人情所束缚，会消磨人的心性，毁灭人的创作热情。^{（13）}在此，借助伊泽之口，坂口描述了所谓“职业者”的现状：职员们装出艺术家的派头，靠酒精寻求同党，靠情面维系平庸；艺术家们的热情变得狂躁无比，制作的电影“如同白纸般空洞无聊”，由此进一步揭示了伊泽所面对的矛盾，即时代的流行与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大众化的选择与个性的，独创性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伊泽正是无法放弃艺术的个性，自我存在的独特性，才被同僚视为异己，不断遭到排挤，敌视甚至打压。

审视伊泽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我们可以认识到伊泽面临的双重性的迷茫与困惑：一个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与以“邻组”为代表的战争体制下的日本这一存在空间出现了必然的矛盾；一个是作为独立的“职业性”的人物，与必须“为日本服务”或者所谓“流行”的“职业”服务之间出现了冲突。事实上，无论是小巷的人们，还是与伊泽一样的职员，尽管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却拥有一个共同点：采取毫无意义的行为去打发无聊的生活，麻痹各自的神经。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他者或者存在空间，使伊泽无法认同现世价值观，成为了一个另类的存在——没有同伴，找不到精神出口，犹如孤独的行者在生活与工作的两极之间穿行。就这样，坂口以极端的方式，矛盾的话语，展现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混乱失序的伦理环境，凸显出这一伦理环境下日本人的无聊，空虚和扭曲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一个悬念：伊泽将走向何处？

二、选择与堕落

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所谓“伦理选择”，就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根本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并强调“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之所以如此，在

于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14）}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人需要扮演多重角色，因而也拥有了多重伦理身份。就《白痴》这部小说而言，伊泽的伦理身份主要体现为：第一，以共同体——国家为基础的身份，即作为“国民”的伦理身份；第二，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即作为记者，导演的伦理身份；第三，作为普通人的社会身份——白痴女的邻居的伦理身份。

首先，就以共同体——国家为基础的身份，即作为“国民”的伦理身份而言，服务国家，服从国家意志，乃是伊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绝对”的选择，伊泽的个人意志必须让位于国家意志。但是，伊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战场？小说之中，面对社长“你为何不辞去工作呢？是怕入伍吧”（10）的诘问，伊泽无言以对。事实上，伊泽也曾想过不如去当兵算了，却没有付诸行动。不仅如此，伊泽生活的小巷世界几乎都是女性，小说之中所提到的男性，诸如街道主任（可以理解为大政翼赞会邻组负责人），海军少尉，满洲无业者等，皆是与军务直接相关的人员。但是，伊泽并没有如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一样走上战场，而是“逃避”了自身作为国民的责任，留在本土。换言之，在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陷入矛盾之际，伊泽选择了个人意志，自国家制度下的“国民”身份“堕落”下来，也就代表着自身作为“国民”的败北。

其次，就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即作为记者，导演的伦理身份而言，伊泽实质上也没有坚定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操守。所谓“文化人”或者“艺术工作者”，应该具有不屈服体制或者反抗体制的，具备个性和独创性的人。这样的个性或独创性应当来源于艺术者自身，而不是共同体或者他人。1939年，日本实施电影法，制定了电影制作·配给的许可制，从业人员登记，脚本事前检阅，强制上演文化电影与新闻电影等一系列法律。^{（15）}并于该年在占领区南京和北京相继成立了中华电影，华北电影。伊泽的公司正是基于这一法令，才不断拍摄与时局联系紧密的电影。小说之中提到：“公司正在制定计划拍摄《保

卫拉包尔《监视飞往拉包尔的飞机》等宣传片时，美军已经通过拉波儿在塞班岛着陆了。在《塞班岛决战》规划会议还没有结束时，塞班岛就失守了。”（10-11）职业伦理要求伊泽必须屈从于战争体制，为这一体制服务。但是，作为个体，伊泽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失去生存保障；作为文化人或者艺术工作者，伊泽必须尊重自己的个性，保持艺术的追求。在此，伊泽的生存需要与精神追求导致伊泽陷入到了伦理困境之中。^{〔16〕}为了生存，伊泽最终放弃了艺术理想；只要活着，就必须一贯的屈服于战争体制。

第三，作为一个社会人，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令其丧失了作为“人”的伦理身份。《白痴》的第一个谜团，就是伊泽是否要收留白痴女，这也构成了伊泽面临的一大伦理选择。从伦理身份来说，作为白痴女的邻居，伊泽与她素昧平生，留宿将触犯了伦理禁忌，违背了伦理规范；但是，从生命救助的角度来看，白痴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伊泽，伊泽应该保护她，维护她的生命。就这样，伊泽不管如何选择，都会陷入到“伦理悖论”之中。更为关键的，伊泽不管如何选择都会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困境。伊泽最终选择了收留白痴女，“就权当义务保护这个白痴女。”（12）这样的选择也让他自己感到激动。这一激动来源于长期苦闷压抑的精神。丧失作为国民与艺术者的伦理身份，失去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伊泽希望通过这一行为找回一点作为人的意义与价值。不过在此，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样的“找回”是以自我身份的“堕落”而得以实现的。

伦理悖论不同于逻辑悖论。逻辑悖论是绝对的，无法解决的；伦理悖论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解决的。（255）伊泽选择了与白痴女共处的方式来解决不得不面对的伦理悖论。所谓共处，必然是趋向“同类存在”，在这部小说中则呈现为与“另类存在”的共处。如果说伊泽是一群精神正常人之中的“另类”的话，那么小说再现的第二个另类的存在就是白痴女一家：白痴女的丈夫风流倜傥，却是一个怪人；白痴女漂亮娴雅，胆小老实，时常躲入猪圈之中避难；婆婆歇斯底里，让人生畏。或许正是这样的“另类”，让二者进入到了

彼此的世界之中。小说之中，当伊泽意识到白痴女是因为爱慕他才出现在家里的时候，其作为个体的道德底线开始崩塌，开始了与她同居的生活。人是一种善恶并存的存在，人的伦理选择源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17〕}伊泽善意地收留白痴女，是人性因子主导的结果。但是，伊泽与他人妻子同居的行为，却受到了兽性因子的主导。当一个人只剩下肉体欲望的时候，也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

由此可见，伊泽的“选择与堕落”，事实上呈现了在作为国民，作为记者与导演，作为白痴女的邻居的多重性的伦理身份之中。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多重伦理选择下丧失身份，逐渐堕落的过程。伊泽逃避了作为国民奔赴战场的责任，选择困居后方的“堕落”；偏离了作为“记者，导演”的艺术家的个性，选择为了生存而屈服的“堕落”；收留白痴女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选择了违背世俗道德的“堕落”。就在这样的不断地选择之中，伊泽不断地“堕落”下去，失去了一个作为国民，作为文艺工作者，作为白痴女的邻居的“身份”。

三、救赎与重生

承前所述，《白痴》这部小说展现了主人公伊泽如何经历一个国民，文化人，普通人的多重身份不断“堕落”的过程。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这样的多重性的“堕落”，也可以把握为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不断交锋的过程。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之中，理性与人的动物性本能（兽性因子）相对，是指人关于善恶的高级认知能力。理性意志则是人性因子的核心和外在表现。（253）不言而喻，作为交锋的结果，“自由意志”获得了胜利，从而也导致了伊泽的持续“堕落”。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堕落”之中实现“上升”式的“救赎”？

对于“国民”这一身份，伊泽事实上并不曾留恋它。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之中提到，“战争期间的日本简直是一个理想家园，到处盛开着虚无的花朵，这并不是人间真实的美。”（《堕落论》42），揭示了“战争”与“谎言”的同一性。因此，若是伊泽屈服于体制之下，那么也就会彻底地沉

沦下去，根本无法获得拯救。事实上，作品最后伊泽选择与逃难大军诀别，已经暗示了伊泽脱离“国民”这一身份，尝试回归到私人性的自我的世界当中。

对于“文化人”或者“艺术工作者”这一身份，伊泽也不再以此作为自我追求的目标，而是选择了放弃或者逃避。处在战争语境下，标榜独立自由的“文化人”最终成为了日本政治的鹰犬。在这一语境下，伊泽也不得不放弃抵抗而选择了屈从，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换言之，选择生存，即意味着逃离“文化人”这一身份的本质，意味着无法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不言而喻，这两种“堕落”实质上暗含了对战时体制的抵抗，也成为再度找寻自我身份的要因。

真正让伊泽找到救赎之路的契机，就是与白痴女之间的交往。小说之中的白痴女形象，深刻地触动了伊泽的心灵。白痴女到达伊泽家第一晚，因为伊泽没有关注她的肉体而感到难堪，意识到这一点的伊泽无比震惊，同时感慨“自己最需要的正是像白痴一样的内心，幼小且真实。可是自己却把它忘记了，在肮脏的俗世一点点被染黑，追寻着虚妄的影子，疲惫不堪。”（14）由此可见，白痴女的到来反而刺激了伊泽去反省自我，成为伊泽打开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生命的重要契机。

不过，就整部小说而言，伊泽对待白痴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带有了回复往返的过程。一方面，伊泽从心底排斥白痴女，将之视为只有兽性因子没有人性因子的存在。小说之中，两人在壁橱中躲避空袭，坂口描写道：“人是有理智的，没有比丝毫没有理智，克制，抵抗更可怜的了……没有比没有理智的落泪更丑陋的了”，躲在壁橱中的白痴女“没有言语，没有喊叫，没有呻吟，也没有表情，甚至没有意识到伊泽的存在”，伊泽认为“这种毫无意识的苦闷丑陋得不堪入目”（20）。在伊泽眼中，白痴女根本不算是一个人，而不过是一个动物而已。在对白痴女的描述之中，坂口也大量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将之比喻为“青虫”，“泥土做的玩偶”，“猪”。——将之比喻成动物，意味着伊泽眼中的白痴女不具

理性意识，而是可悲的，丑陋的存在。

另一方面，白痴女是伊泽的“理想”女性。与普通女子生活，会被每个月的工资捆绑，自身也会变得更加卑微。只有白痴女，才不会为这两百元的“恶灵”所束缚，也就是说白痴女超脱出了世俗社会，让伊泽“已经被腐蚀”的“渺小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16）同时，正是因为她的动物性，她的本真，纯粹的性格才不会被俗世污染。白痴女“就像一块极薄的玻璃片，喜怒哀乐一展无余”，（16）而玻璃片也成为伊泽的一面镜子，让伊泽不断反观自身——白痴女对肉欲毫无掩饰的渴望，对死亡赤裸裸的恐惧，以及“绝对的孤独”都是最为本真的表达；所谓的理性，世俗道德在它面前变得虚妄，这种纯粹让伊泽既害怕又向往。一方面，伊泽曾经想要抛弃白痴女，因为他害怕这个俗世的眼光，在意所谓的道德，更害怕改变自我，彻底“堕落”；另一方面，白痴女代表的世界又让伊泽找到了归宿。经历空袭之后的伊泽选择了与逃难大军相反的道路避难，面对熟睡的白痴女，伊泽已经“没有遗弃这个女人的勇气和‘洁癖’”（29）。伊泽决定天亮后叫醒女人，重新寻找安身之处。尽管坂口安吾在此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一结局则不仅暗示着伊泽与俗世的诀别，还象征着伊泽的最终选择，即向“白痴”的世界的回归。

面对不可调和，难以逃避的伦理困境，伊泽选择了否定性的“堕落”。通过彻底的“堕落”而获得重生。小说到了最后，“他（伊泽，笔者注）这样想：今天会不会天晴呢？太阳会不会照到我和我身边这头猪的背上呢”（29）。伊泽最终抛弃世俗，将自己降格为“白痴”，通过这一新的身份去迎接太阳，期盼一种救赎与重生。“人类的最终栖息之地是故乡，你就是常住我故乡的那个人。”（14）这就是伊泽内心的真切告白，也是伊泽真正觉悟，找回自我，获得新生的契机之所在。

四、《白痴》与“白痴”

何谓“白痴”？作为核心概念，或许在此也必须加以解答。在此，或许我们会联想到前文阐述的日本评论家平野谦曾指出的，人要堕落成为动

物性的人，丧失一切伦理道德，犹如作品开篇提示的人间地狱图一般。⁽¹⁸⁾不言而喻，这样一个认识对于“白痴”或者“堕落”的概念界定或许过于片面，过于简单化。坂口所指的“白痴”，绝不是所谓的低能，或者只具备动物性的属性，而是脱离了社会身份，作为人的自然且纯粹的存在状态。就此而言，堕落与白痴在此构筑起了一个诠释之链。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作为“堕落”的落着点——“白痴”，坂口安吾针对“白痴”究竟要阐明什么？借助坂口自身的叙述，或许可以确认一点，即坂口试图通过《白痴》教导世人：“人有必要选择正确的道路堕落。”⁽⁴²⁾究竟什么是“正确的道路”？《白痴》是否提示出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对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文本分析，探讨在《白痴》这部小说之中，坂口安吾针对“白痴”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潜在意象究竟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推导方式。

坂口安吾的“白痴”形象构建，首先是以伊泽眼中的“白痴女”的形象而呈现出来的。即是说，白痴女的形象作为一个“参照物”，构筑起伊泽的“白痴”认识的最初印象。站在理性的精神层面，“人是有理智的，多多少少会有些许克制和抵抗，没有比丝毫没有理智，克制更可怜的了”。但是，白痴女却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毫无意识的苦闷”，拥有人不会有的绝对的孤独。⁽²⁰⁻²¹⁾《白痴》这部小说所影射的现实世界的伦理观念之中，“理智”代表的精神性，道德性是既定的观念准则。⁽¹⁹⁾作为小说之中的异类，白痴女则是理性走向“堕落”的产物，是作为“无意识”的“躯壳”而存在的形态，也是“绝对的孤独”的具象化。

其次，小说之中的“白痴”亦象征着一种自我身份的“堕落”。不言而喻，这一形象是对于既定的“国民”“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等被符号化了的人的形象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意味着针对国家体制的彻底批判。在《堕落论》这部评论中，坂口曾对国家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所谓的天皇制，武士道不过是政治产物，其存在的理由来自于政治家的“嗅觉”。（《堕落论》36）在《续

堕落论》中，坂口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只要天皇制存在，历史性的精心策划就会一直留存在日本观念中，日本就不可能盛开真实的人类和人性之花”。（《续堕落论》50）政治束缚了人性，人首先要大胆的从制度上堕落下来，“想通过政治实现救赎，过于愚蠢肤浅”。（《续堕落论》42）这样的堕落，无疑象征着抛弃自身作为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亦被视为了违背道德的行为。不过，坂口认为，国家意志不过只是政府的意志，并不足以代表国民的意志。在国家意志违背国民意志，束缚人性之际，国民理所当然应当从国家意志之上堕落下来，以堕落的方式去奋力抗争。这才是符合人性的选择，任何制度也阻止不了。只有彻底打碎违背人性的国家机器，才能够获得新生。

第三，“堕落”的落着点，在于“白痴”的形象构筑；“白痴”的形象构筑的落着点，指向了朝向“故乡”或者“母胎”的回归。针对“人性的真实”，即“欲望”，坂口提出的具象化的答案——即“白痴”的形象。那么，“白痴”与“故乡”究竟该如何接续在一起？如果说《白痴》这部小说试图对虚伪的道德进行讽刺的话，那么与之对应的“盲目，无意识，绝对孤独”的“白痴”这一形象则是作为脱离了虚伪，无道德的象征而存在。就《白痴》而言，这一原点的具象化就是“无垢性”的肉体，也就是在战后“遗弃延续至今的封建‘健全道义’，回归真实赤裸的大地，并通过这种遗弃，回归到真实的人间。”（《续堕落论》50）不可否认，坂口的目的不在于“绝对的毁灭”，而是在于“彻底的重生”，松田将之称为“朝向母胎的回归”。⁽²⁰⁾正如日本学者久保田芳太郎所指出的，坂口在战后作品之中不断寻求一种赤裸的人类存在，并将所有赌注置于这一原点之上。⁽²¹⁾坂口追求的不是道德的沦败，而是要与既有传统诀别，通过以“母胎”为目标的终极回归，确立“赤裸的人类存在”，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转换与认同的“自新”。

针对《白痴》之中的“白痴”形象塑造，坂口安吾采取了树立他者，否定现实，批判封建传统的方式来展开阐述：一是提示了作为“参照物”

的白痴女，带有了否定与批判理性的内涵；二是针对伊泽的身份加以彻底否定，连带着针对国家体制的批判；三是在批评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起一种回归“无垢性”的肉体或者人的赤裸存在的“故乡”，树立起“真实的人”的存在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坂口阐释了与过往的学者，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伦理选择，也构筑起了独特的身份定位。

战争，对于坂口安吾而言，并不是“毁灭一切”的根源，而是代表了新的希望或者契机。小说之中，伊泽意识到了侵犯他人妻子是伦理犯罪，违背了伦理道德，内心的道德规范让他不安恐惧，故而时常期待战火可以毁灭一切，杀死白痴女，以免败露行径。坂口采取反讽的口吻来描述伊泽的心理：“他静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并嘲讽那可能是好事。”（21）“啊！日本要战败了！同胞们如同泥人般垮塌，……但是如果苟且能生存下来的话，对于新生命的新生，无法预料的新世界和废墟之上的重生，伊泽尚存好奇。”（15）“战争”作为否定旧式道德的手段，可以实现人对过去的超克的反命题，可以让世人借助这样的“伟大的破坏”来寻求解脱。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伊泽期望通过“战争”这一手段（绝不是必然的手段或者唯一的手段）谋求自身的解脱。

国家，作为既定道德的体现，始终是坂口批判的对象。坂口曾经指出：“日本战败后，武士道亦灭亡，只有回到堕落的真实母胎，人类才可诞生。”可以说，战败之于坂口来说反而成了摆脱“历史的机关”，脱离“国民身份”这一枷锁，“去往新世界的不可思议的重生”的最好契机。（39）回到《白痴》这部小说，针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多重身份，尤其是“国民”这一身份，坂口认为唯有脱离了这一“身份”，才能真正地得以获得一个新的，彻底与过去决裂的身份从而再生。这样的身份，就是脱离了“国民”“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等标签的，纯粹的人的形象。坂口正是对战时体制的“欺瞒性”产生了巨大怀疑，故而希望将个人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制度”之中脱离出来，探寻一个“孤独”个体的生存之道。

故乡，才是坂口始终寻找的对象。在否定了作

为天皇制国家的日本之后，也就是在经历了针对既有的道德准则的质疑与批判，从“共同”的“道德性”之中被放逐和异化出来之后，坂口将“故乡”落实到了“无垢性”的肉体之中。⁽²²⁾ 小说之中，白痴女作为丑陋的存在所呈现出的“无意识”的“躯壳”，作为“绝对的孤独”的具象化产物，超越了既有观念下的道德重塑的范畴，以一种实存的“肉体”方式参与到新生与创造之中。坂口笔下的“故乡”的本源即在于“如同身处旷野，根本无法期待拯救的家园出现”。（《文学的故乡》195）坂口笔下的“堕落”，实际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人最为本真的状态。这样的“堕落”恰好回应了“人类真实的美”，“人类的最终栖息之地是故乡，你就是常住我故乡的那个人。”（14）

正如日本学者宫泽隆义所指出的，针对战争，国家，历史等一系列范畴，坂口几乎皆是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方法来加以把握，尤其是针对以天皇制，道德，制度等为代表的“国家”范畴，坂口基本上是将之作为一种“方便”法门来加以利用。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它，追求接下来的展开或者向上。”⁽²³⁾ 换言之，坂口安吾的“堕落”，不仅是一种朝向“故乡”或者“母胎”的回归，实质上也意味着一种自我生命的“展开或者向上”。这样的一个否定，展开或者向上，也就构成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永劫回归”。正因为如此，坂口安吾的“堕落论”被称为了“战后思想的原点”。⁽²⁴⁾

结 语

评论家林淑美曾经指出，《白痴》小说主人公伊泽的存在空间的高压强权体制扭曲人性，必将使人异化，丧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人性因子”。不过，坂口安吾在小说中毋宁说一直在试图消解这样的“外部要素”的限定：一个是间接揭示导致乱象的真正根源不在于“战争”，并借助他者来确认这一外部环境的“原初性”；一个是始终与“理性意志”保持一定距离，重点突出了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如果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小说，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解读的可能性。

通观《白痴》这部小说，主人公伊泽可谓经历了多重性的“伦理选择”，才确定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把自身降格为“白痴”，走向彻底的否定，从而找到了自我价值之所在，也成就了自己。人要自救，也要他救。在自救与他救之中来确证自我。就这样，为了生存，伊泽从国家体制上堕落下来，放弃了艺术理想，抛弃了作为“人”的道德。在不断经历“堕落”的过程中，伊泽将“白痴”作为了目标，将“故乡”的追寻作为了目的，由此而谋求获得真正的救赎。

概言之，坂口安吾通过迷惘与困惑，选择与堕落，救赎与重生等一系列问题的设定，尝试构筑起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伦理。《白痴》这部小说不是要人们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存，也不是要人执着努力，始终奋斗下去，而是要抱着遗忘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不断地进行“伦理选择”。就在这样的为了生命，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中，作品所刻画的“白痴”形象跃然纸上。⁽²⁵⁾一言蔽之，“白痴”实质上并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世相”，一个“符号”，一个“形象”。也就在这样的反讽，荒诞，游戏一般的假设之中，自我存在的依据，价值或者意义得以彰显出来。

<注>

- (1) 围绕《白痴》这部作品的解读，日本学者宫泽隆义以“空袭”作为外在表象，将之与坂口创作的《白痴》联系在一起加以解读。参考宫泽隆义：『坂口安吾の未来——危機の時代と文学』。東京：新曜社，2015：122-123。
- (2) 该评价出自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参考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編：『石川淳・坂口安吾』，東京：有精堂，1988：287。
- (3) 島田昭男「何処へ——女体追求の意味するもの——」，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石川淳・坂口安吾』，東京：有精堂，1988：287。
- (4) 平野謙『文藝時評』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3：11。
- (5) 十返肇「坂口安吾論」，関井光男編：『坂口安吾研究Ⅰ』。東京：冬樹社，1972：126。
- (6) 松本常彦「『白痴』論の前に」，『解釈と鑑賞』，

第71卷11号（2006年11月号）：108。

- (7) 周异夫「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战争反思」，《社会科学战线》，5（2015）：127-128。
- (8) 梅原猛『虚無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8：44-45。
- (9) 坂口安吾著，吴伟丽译：《白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5。本文围绕坂口安吾《白痴》，《堕落论》，《续堕落论》，《文学的故乡》等作品的译文均出自该书。《白痴》的引用，本文只在引文后提供文集之中的页码，其他评论则提供作品名与页码。
- (10) 林淑美「<モラル>と呼ぶ概念の創造——『白痴』と安吾の戦後——」，林淑美『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374-402。
- (11) 作为参考文献，在此可以提示两部研究文本，一个是半藤一利著述的『坂口安吾と太平洋戦争』（東京：PHP研究所，2009年）菊地薰「安吾の<戦争>——坂口安吾の『白痴』論」（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国語・国文学編>）第48号，2000年2月。
- (12) 事实上，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也提到这样的主题，即“不是因为败于战争而堕落，正因为是人，故有才堕落。只是因为活着，故有才堕落。”“只有彻底地堕落到了堕落之道，我们才能发现自我本身，才能拯救自我本身。”（《堕落论》）参阅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石川淳・坂口安吾』，東京：有精堂，1988：290。
- (13) 相馬正一：『坂口安吾 戦後を駆け抜けた男』。東京：人文書館，2006：43。
- (1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判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64-265。
- (15) 『世界大百科事典』，“映画法・日本映画”<https://kotobank.jp/word/%E6%98%A0%E7%94%BB%E6%B3%95-1148952>
- (16) 围绕伊泽的心理活动，即伊泽是否具有趋向日本的战争体制这一“闇”的问题，日本学者大原祐治曾就此展开探讨。在此也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日本学者是否真正地意识到拥护战争，参与战争就意味着艺术“缺失”或者“人格”丧失。不过，这一论判的逻辑前提，就是设定了“艺术与国策”必然对立的立场。参考大原祐治：『文学的記憶・一九四〇年前後——昭和期文学と戦争の記憶』。東京：翰林書房，2006：255-256。

- (17) 张能泉「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交锋——论《途中》杀妻行为的伦理阐释」，《当代外国文学》3 (2017) : 136。
- (18) 平野謙：『文藝時評』。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3 : 11。
- (19) 中畑邦夫「『観念』と『肉体』——坂口安吾『白痴』の執筆背景——」，『麗澤大学紀要』(95) 2012 : 79。
- (20) 松田修「母胎への旅——狂気と酩酊」，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石川淳・坂口安吾》，東京：有精堂，1988 : 254-261。
- (21) 久保田芳太郎「坂口安吾——戦後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坂口安吾研究講座Ⅱ』。東京：三弥生書店，1985 : 2。
- (22) 围绕“故乡”这一问题，事实上，川端康成提出的作为实存空间的“雪国”，坂口安吾《吹雪物語》揭示的作为来源之地的“新泻”，柳田国男的“信州”考察，应该说“故乡”这一概念作为日本学者探索的对象，具有了对抗西方现代性，回归日本传统，揭示日本人的存在样态，阐述近代化语境下的日本人面临的困境等多重性的内涵。围绕这一研究，可以参考大原祐治：『文学的記憶・一九四〇年前後——昭和期文学と戦争の記憶』。東京：翰林書房，2006 : 131-138。
- (23) 宮沢隆義『坂口安吾の未来——危機の時代と文学』。東京：新曜社，2015 : 247-248。
- (24) 佐藤忠男「戦後思想の原点」，神谷忠孝編：『坂口安吾』（鑑賞 日本現代文学）。東京：角川書店，1981 : 303-312。
- (25) 《白痴》这部作品也体现了坂口文学创作自战争期间到战后的一个过渡。《文学的故乡》之中突出的“故乡”观念，《日本文化私观》之中强调的“实质”范畴，战后《堕落论》提示的“生存下去，堕落下去”的思想，正是通过《白痴》这部作品的“扬弃”得以有机联系在一起，也象征着坂口安吾以《白痴》为出发点，实现了战后的“冷静”的“重新出发”。参考花田俊典「『白痴』の位置——戦後安吾文学の出發」，『文芸と思想』，第45号（1981年1月号）：19-30。
(客員研究員)